

2024年10月10日 星期四

主编:周璐 美编:陈昌 版式:邱巍 责校:郑德衡



丁晓平: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现任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大校,编审。开创“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出版诗集、散文集、文学评论集、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50余部单行本。荣获中宣部“五个工程”奖、国家图书奖、文津图书奖、中国文艺评论啄木鸟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秦山核电站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9台机组总装机容量66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520亿千瓦时,也是我国运行时间最长、机组数量最多、堆型最丰富的核电基地,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一大批殊荣,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和“全国文明单位”。

在秦山核电采访的日子里,“一颗螺丝钉”的故事时时挂在他们的嘴边,始终没有忘记。秦山核电党委书记、董事长黄潜满怀深情地告诉笔者,这是他经历的秦山核电最重大的考验。他说:“那是1998年,30万千瓦堆换料大修时,发现装燃料的吊篮底部存在指套管等异物,检修需要180度翻转、切割、钻孔、拧螺丝等一系列操作,而且都要在放射性水下进行。当时我们没有经验,就请了国外专家来技术指导。从组织检查、与外请专家公司谈判、安全评审到最后实施,我都亲身参与了组织工作。虽然最后顺利解决了问题,但也给我们带来了—次极为深刻的教训。”

的确,对秦山核电来说,那是一场考验!也是一场危机!

1998年3月,时任秦山核电公司党委书记的林德舜被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任命兼任公司总经理。上任不到半年,林德舜就碰到核电站出现重大技术故障。他说:“我虽然对这个担子的压力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出乎意料的严重事件在等待着我,现在我想起来还感到有点惊心动魄。”

这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呢?

当年7月14日,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按计划停机停堆,开始第4次换料大修。谁知,检修刚刚开始,即发现反应堆下部中子通量管抽插困难,接着用水下照明进一步检查,发现有部分中子通量管损坏严重。这是核Ⅰ级设备损坏!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林德舜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核电机组每停一天都要产生数百万元的经济损失,而核电机组能不能修好、何时修好,都在考验着公司的每一位员工。

怎么办?做进一步检查!

怎么检查?实事求是地说,以秦山核电站现有的手段和设备,根本没有办法彻底搞清楚水下吊篮底部的情況!

下一步该怎样走?要分析原因!什么原因?是设计问题,是设备制造缺陷,还是运行管理造成的?

秦山核电,再一次惊动了北京!北京的一个又一个检查组,来到了秦山。秦山的天空再一次笼罩在不可预知的雾霾之中。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各种消息满天飞。

这时有一个比较主导性的意见浮出了水面——秦山一期(即秦山核电站30万千瓦压水堆)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核电站,出了问题也应该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检修。为啥?理由也很简单,这样做既符合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精神,又可以防止把我国自己研制的核电站的结构、数据泄露给外国人。这个意见好是好看,但从目前国内的核电检修技术、设备和经验来看,难度非常大。

林德舜心中没底。这时,还有一个声音在林德舜耳边回响——秦山二期、三期工程正在开工建设,秦山一期发现的故障必须尽早解决,而且绝对不能出事!否则,有可能断送中国核电事业的前程!

林德舜瞬间有了一种压迫感。那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彻夜难眠,人也整整瘦了一圈。是啊!运行了7年的秦山核电站,如今在自己的手中趴下了,怎么交代?!

分管设备检修工作的公司副总经理耿昌心也是同样着急上火。1994年4月,秦山一期在投入商业运行后开始着手准备第一次换料大修。耿昌心被任命为主管机械工作的副总工程师,迅速组织起一支技术骨干队伍,开展大修准备和组织实施工作。首次换料大修,对耿昌心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他采取多开会多交流的方式,向老同志请教,把运行、检修和管理人员全都发动起来,群策群力,做好大修网络计划,并坚决执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换料大修工作从1994年10月21日开始,至1995年1月25日结束,实际工期93天,比预定计划的99天提前了6天。当机组再次投入运行的时候,耿昌心悄悄松了口气,他和同志们在学习和实践中为以后的换料大修积累了经验,探索了道路。

但是,这一次,又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在检修现场,只见检测探头正在水下反复移动检查,望着黑白显示器里模糊不清的画面,耿昌心忽然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张玉良。1985年,秦山核电站成立检修部,张玉良担任机械队队长,主要负责生产准备。1991年,作为队长,张玉良带领29名队员,顺利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首次装料任

一颗螺丝钉的大讨论——秦山核电站的成长之路

□丁晓平



从《哥德巴赫猜想》说起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论断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我们仍然清楚地记得,以1978年1月《人民文学》发表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为标志,开启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双向奔赴”的新篇章。

如何讲好我国核电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故事”,如何写出核能新质生产力的“秦山样本”,对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而且,采访、研究越深入,越感觉艰难。尽管秦山核电的历史并不遥远,但是获得的资料数据也足足有5吉字节,上千万字,要写出“老秦人”的精、气、神是多么的艰难!采访归来,在点灯熬油的艰苦写作过程中,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秦山核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直接决定了我写作的立场、方法和价值判断,以及结构和叙事方式。深思熟虑之后,我想,让人们在一代代“老秦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强核报国、创新奉献的故事里,看到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

《哥德巴赫猜想》写的是数学家陈景润一个人的故事,而我创作的《泰山里的中国》写的是核工业人集体的群像。40年来,秦山核电独立自主地完成了从“零的突破”到

务。从7月31日至8月8日,价值几亿元的121组燃料组件全部安全装入堆芯。时任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也来到了现场,亲自将最后一块标识牌放在模拟板上。那一刻,掌声雷动,当年告别长春亲友奔赴戈壁沙漠都没有掉一滴眼泪的张玉良,忍不住落下了热泪。要知道,那一刻已经写进了新中国的核电发展史!

在耿昌心眼里,张玉良专业素质好、严谨细心,对装卸料系统的机械设备都极其熟悉,装卸料非常有经验,许多问题被其发现后都能够得到及时解决,是十分难得的人才,而且他对耿昌心工作上的帮助和影响也非常大。

耿昌心为什么忽然想起张玉良了呢?因为张玉良曾经跟他说过一件事儿。那是1995年12月,秦山一期第二次换料检修时,检修人员把反应堆吊篮拿了出来。按常规,第二次检修是不应该把吊篮拿出来的。可是,反应堆的水下灯爆炸了,碎玻璃掉进了堆芯,必须把异物取出来。而要把异物清理干净,就必须把吊篮拿出来。清理完毕后,又得把吊篮装回去。

有一天,张玉良找到耿昌心,说:“耿总,我下到水池里去检查,在吊篮存放架的池底下发现了一颗螺丝钉。”

“螺丝钉?”耿昌心警觉地问,“在哪里?”

张玉良说:“我把它存放在铅罐里了。有辐射剂量,可能是从堆芯掉出来的。”

听张玉良这么一说,耿昌心顿时一愣,仿佛有一片阴云从心头掠过。他立即带着张玉良跑到库房查看。辐射防护科的同事小心翼翼地把铅罐打开,用钳子夹出螺丝钉,让他仔细观察。回到办公室,耿昌心立即做了一个详细的记录,记下了螺丝钉的长度和直径,同时向总经理做了口头汇报。后来,他找来图纸,左看右看,始终看不出毛病出在哪里。左思右想,他认为设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东西如鲠在喉,他觉得是一个不好的先兆。

现在出现的故障,难道就是这颗螺丝钉引起的后果吗?

二

耿昌心不敢想,心里隐隐有些作痛。如果早一些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许今天的问题就可以避免,停堆处理的时间就不会太长,损失也不会太大。更何况,反应堆吊篮筒体下部及吊篮支架检查,是通过预先安装的水下探头进行的。现在,传输到黑白显示器里的图像模糊,效果不理想,可能导致判断有问题,也就无法决定下一步怎么做,怎么修。凭自己的设备、技术和经验,已经是山穷水尽了。要想柳暗花明,只能借助外力力量。自力更生没有错,但是,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更不能不得半点虚荣。独立自主没有错,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自力更生不是不向西方先进经验学习,不是挟隘的闭关锁国,重要的是自家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

此时,耿昌心又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名叫保曼,是德国某公司的核技术专家。检修部曾经从他们公司引进过堵管工具。耿昌心与保曼有过

“世纪跨越”,从“国际接轨”到“零碳未来”的卓越式发展,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成为中国核电走出去的“国之硬核”“国之名片”。值得一提的是,在秦山核电基地建设过程中,世界核电先后遭遇了美国三哩岛、苏联切尔诺贝利和日本福岛三次重大核事故。因此,如何让人们了解核电也成为我创作《泰山里的中国》的另一项使命。中国的核电站安全吗?为什么要发展核电?核电站又是如何建成的?核电站是如何发电的?这些曾经也是我脑海里的疑问,都需要我在创作中给予科学的解释和准确的回答。而这篇《一颗螺丝钉的大讨论》正是中国核电人按客观规律办事,秉承“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核工业精神真实又生动的写照。

《泰山里的中国》是科技题材,也是工业题材,是科学和文学的一次跨界,是历史与现实的一次跨界,也是科普与艺术的跨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是一次带有难度的写作,是一次具有挑战性的写作。我希望人们从秦山核电强核报国创业史的“起”“承”“转”“合”之中,看到最美的秦山,看到最美的中国。

一些交往,彼此比较熟悉。保曼曾向他全面介绍过公司的业务,耿昌心知道他有能力 and 手段帮助秦山一期解决现在的故障。

作为林德舜的副手,耿昌心明白大家此刻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于是,他鼓起勇气,向林德舜建议请德国的保曼来谈一次。

在深思熟虑之后,林德舜同意了。

“我们还是应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林德舜说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林德舜的意见,得到了刚刚到任的公司党委书记刘传德的支持。

刘传德是1998年8月从核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的岗位上,调任秦山核电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的。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属于“半路增援”,用他自己的话说说就是一个“插班生”。

刘传德说:“可以分两步走,先请国外有经验的公司来做详细检查,有了结果以后,再决定由谁来修复。”

1998年秋天,保曼从德国赶来了。

在海盐国光宾馆,耿昌心和保曼见面了。两个人一落座,保曼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说:“耿先生,你们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对保曼的职业敏感,耿昌心暗暗吃了一惊,因为现在秦山一期出现的故障还是一个秘密,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向北京报备,得到上级许可后方可实施。

耿昌心没有正面回复保曼的问题,而是先请保曼介绍其公司的业务情况。保曼介绍得非常详细,特别是在核反应堆设备的检修方面,讲得非常透彻,表明自己完全有能力帮助秦山解决核反应堆的所有问题。

从保曼的话中,耿昌心听得出来,他已经或多或少了解到秦山一期的运行遇到了十分棘手的困难。在交谈中,保曼一再表示:“耿先生,我们怎么合作?你们让我们干什么?”

对保曼的问话,耿昌心依然不置可否,客客气气地请保曼好好休息,自己则马上向林德舜报告。而林德舜也要等北京的回复后才能决定,就让耿昌心想办法,请保曼在海盐再多逗留半天时间。

这天中午,耿昌心奉命在国光宾馆宴请保曼。两人一边吃一边聊。

谁知,保曼依然执着地提出自己的老问题:“耿先生,我们怎么合作?你们让我们干什么?”

“不着急。现在是我们江南最美的季节,我邀请你到杭州或苏州去游览,顺便休息休息。”耿昌心微笑着发出邀请,意在挽留保曼。

保曼诚恳地说:“耿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请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遇到麻烦了?我知道你们遇到麻烦是要请示北京的。我今天可以为你们一个下午,今天晚上你们能不能决定,如果今天晚上能决定,我就再等半天吧。杭州、苏州我都去过了,这次就不去了。如果今天晚上还定不了,那我就不能再等了,我的飞机票也都买好了。”

听得出来,保曼是真诚的。

一时间,耿昌心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他不得不再次请示林德舜。

林德舜也有些无奈,说:“晚上还很难说,就让

他先回去吧!”

就这样,耿昌心只好客客气气地把保曼送走了。

当天晚上,林德舜在国光宾馆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公司副总工程师以上干部全部参加。不用想象,会议的气氛有多么压抑和沉闷。面对当前的困境,大家焦急万分,你一句我一句,讨论来讨论去,结果一致认为还是要请ABB公司来检查,待查清楚具体问题之后,再讨论下一步该怎么走。

会上,林德舜当场给北京打了3次电话,汇报了当前的情况和总经理办公会的建议。北京方面似乎仍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

时间不等人啊!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据与会全体人员的意见,林德舜当场拍板决定:先请德国公司进行检查。同时,批准耿昌心明天赶到上海,把保曼追回来。此时此刻,耿昌心知道林德舜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走好第一步,高效而不露声色。

当晚,耿昌心赶到厂里,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准备好的资料图纸全都拿上;二是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他打给了接待科的同事宋英,就是她负责把保曼送到了上海。宋英是一个办事周到又细心的人。她告诉耿昌心,保曼住在上海虹桥机场旁边的一家宾馆,就连宾馆前台的电话,也一并告诉了。第二个电话,他打给了检修部的黄潜,请他担任翻译,马上到自己的办公室,给保曼打电话,约好第二天在上海的宾馆面谈。

第二天一早,耿昌心和黄潜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上海。

在宾馆大堂,与保曼见面了。他们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了下来。

这一次,耿昌心开诚布公地说:“保曼先生,我们确实遇到困难了。”接着,耿昌心把秦山一期反应堆换料大修遇到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向保曼作了介绍:“我们想请你来做进一步的检查,你们能做到吗?”

“其实,你们请我来,我就预感到了。否则,你们的机组也不会停那么长的时间。我们的能力和水平昨天都介绍过了,你们可以放心,我们能做到。”保曼诚恳而自信地说,“这些资料能不能留给我?”

“可以。但我有两个条件:一是这些图纸不是正式的图纸,仅供参考;二是这套图纸你拿回去后,不能复印,只有这一份,将来还要还给我们。”耿昌心在得到保曼的肯定答复后,把图纸留给了他。

接下来,两个人开始谈价格,谈责任。谈好之后,已是天黑时分。此时的林德舜正在秦山焦急地等待着。接到耿昌心的电话后,一颗悬浮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下来。

然而,这毕竟还只是秦山核电自己的决定,是林德舜拍板的。在耿昌心回来的第二天,林德舜就对耿昌心说:“老耿,走,咱们上北京!”

说走就走,两人急急忙忙赶到北京,见到了领导,赶紧把心中的苦闷、苦痛、苦水都倒出来。林德舜和耿昌心两个人把秦山一期换料大修遭遇的困境,全部倒了出来。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更先进的检查手段,如果等国内设计单位开发研究,谁也不知道要研究到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现在只能也只有请国外公司先把问题查清楚,才是最有利、最可行的方案。

“我们实在等不起啊!”

“你们的意见,我看可行。确实等不起啊!”在得到中核总公司副总经理李玉崙和其他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下,林德舜一回到秦山,当即决定,由耿昌心负责请ABB公司对核电站反应堆进一步检查。

从9月12日开始,保曼所带领的德国公司团队经过14个昼夜的检查,很快查出了结果,故障情况及原因也全部查清。国内外专家分析后一致认为:由于秦山一期30万核电机组是原型堆,吊篮下部结构的松动作连接不够完善,抗振动冲击强度不够,松动作脱落,导致吊篮下部的中子通量管导向管破裂或断落。吊篮下部结构进行修复后可以继续运行。

然而,吊篮下部的中子通量管的损坏程度还是让耿昌心吃了一惊!更令他不解的是:“我在看图的时候居然没有看出来,这是不应该的。为什么?”他反复查看图纸,对照录像图像,分析原因——如果设备制造单位按照设计图纸和要求去认真执行,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图纸没有问题却又出现了故障,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源可能还是在制造过程中。经过谨慎细致的比对、研究,耿昌心发现反应堆的堆芯底下有一个固定螺丝,图纸上要求是全部满焊焊死,可实际焊接时却是鼻焊。因此,仅仅从图纸上是发现不了问题的,又怎么可能知道这颗小小的螺丝会掉下来呢?

于是,耿昌心找到了设计单位,很快就证实了自己的结论。图纸设计要求是焊死,可焊接工人却认为无法按图纸去做,设计与制造双方缺乏理解 and 沟通,最终导致图纸与实物存在巨大误差。

原因查明了,现在该决定怎么修复、由谁来修复了。

三

检查难,修复更不容易。摆在林德舜面前的又是两种选择,要么立足国内,要么选择国外。

根据立足国内组织力量进行修复的意见,林德舜请国内有关设计院提出了方案:设计院认为要把吊篮取上,翻转后再修复。为此要先设计、制造一个吊篮翻转支架,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而其他准备工作还需要多少时间,一下子还说不清楚。显然,这个方案与各方面的要求差距太大。

不能再犹豫了!优柔寡断是干不成事业的。林德舜再次果断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请国外有经验的检修公司进行修复。还是像上次一样,为了说服上级,林德舜又多次往返北京和秦山,分别向总设计师、核能专家、中核总领导一一作了汇

报,最终请经验丰富的国外检修公司的意见获得批准。

1998年9月下旬,秦山核电公司向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4家公司发送了招投标邀请书。10月下旬,林德舜带领秦山一期团队分别到4家公司接触。在海盐国光宾馆,经过第一轮谈判,法国公司和日本公司都表示能够胜任修复工作,但因其计划修复时间过长,中方不能接受而打道回府。

这时,林德舜作出了一个智慧的决定——移师北京,与德国公司和美国公司再谈,目的是能够更加快速、及时地向总公司领导汇报,以便第一时间作出决定。

北京,1998年的冬天,是一个不太寒冷的暖冬,但对早已习惯了江南生活的人来说,北方的风还是格外刺骨。林德舜和耿昌心带领一个庞大的谈判工作小组,马不停蹄地到了北京。抵达谈判地点,他们立即通知德国公司和美国公司,在晚餐后就开始谈判,第二天下午4时宣布谈判结果。

饭后,他们先与美国公司谈。这一谈,就是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早晨6时30分才结束。稍事休息后,从上午8时开始,他们又与德国公司接着谈。谈判结束后,他们马上赶到三里河核工业部大楼向中核总的领导们汇报。

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在林德舜的带领下,谈谈停停,大家两天一夜没合眼。耿昌心冲在前面,林德舜就在隔壁房间等候。谈判就像一场拉锯战,你来我往,打打停停。双方谈一段时间,大约两个钟头,谈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在休息的时候,耿昌心就向林德舜汇报,听意见,调整谈判思路,再接着谈。对方也是如此,也要向公司总部打电话,向上级主管领导汇报。

耿昌心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每一次中间休息的时候,一敲开林德舜的房门,总是看见他孤独地坐在沙发上,香烟不离手,表情凝重,不看电视,更不睡觉,对他的每一次报告和请示,总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果断的答复。他能感受到林德舜作为总经理在此时此刻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对于参加谈判的每一个人的精神、意志和能力都是巨大的考验。

漫长的谈判和焦急的等待,让耿昌心和他的谈判小组憋足了一股气。当美国西屋公司提出24小时倒班作业时,得到了秦山核电公司的积极响应和支持,首开24小时检修倒班作业之先河。每个班,中方可以安排两名会说英语的员工与美方技术人员一起工作。这样的安排,不仅能让中方员工学习到新知识、新技术,而且并肩战斗的经历,也可以让中方检修部人员与美国公司员工之间建立起深厚的个人友谊。显然,这样的合作模式,是符合中方利益的。

经过对德国公司和美国公司提供的技术方案、修复时间及合同价格的综合比较,这天下午4时,中方准时宣布了谈判结果,美国公司中标!

1998年12月,与美国公司签署了吊篮修复合同。1999年3月13日,国家核安全局审查通过了该公司技术方案。1999年3月16日,美国公司检修人员进驻秦山,修复工作正式开始。1999年6月18日,经过近100天加班加点苦干,修复工作全部结束。

1999年6月24日,经国家核安全局检查,认为修复工作质保控制有效,吊篮修复工作取得满意结果。这天16时,国家核安全局宣布同意释放第一个控制点;23时,修复后的吊篮顺利返回堆内。

1999年7月,正当秦山着手准备装料时,又发现一条海水地理管道破裂。在处理过程中,因管道焊接按原始资料不全,不得不重新铺设,接着又日夜兼程干了一个月,1999年8月初国家安全局审查通过。

吊篮修复工作从发现故障到修复结束,历时1年。1999年9月16日,秦山30万千瓦核电机组在历时艰难曲折的14个月中,再次并网发电。从此以后,机组进入了一个稳定、持续、可靠的良好运行状态。本次换料大修出现的吊篮故障,在秦山核电历史上又被称作“T6事件”。

“T6事件”,仅仅因为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耗资1600万美元,使秦山核电公司经济效益受到严重影响,如果再推迟1个月,连员工的工资都没有钱发了,着实让林德舜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但其处理和修复过程,对秦山核电公司核安全文化理念的提升及运行管理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四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都需要辩证地来思考。

林德舜决心把坏事变成好事!他趁热打铁,在全公司开展了一场“一颗螺丝钉的大讨论”,发动全厂职工学习国际原子能机构编写的《安全文化》,并签发《秦山核电厂安全及质量政策》。同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帮助下,启动了中层管理干部培训计划,开展了大规模学习活动,先后派遣5批干部分别赴美国、法国、韩国等有关核电厂学习培训,结合已经在执行、落实运行安全评审专家意见进行的整改,开展自查自纠活动。

“变被动为主动!化危机为转机!”这是藏在林德舜心头多年的想法。

“一颗螺丝钉的大讨论”,在秦山整整进行了一年的时间。

20多年过去了,想起秦山这“一颗螺丝钉的大讨论”,黄潜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反思,并将整个管理层分成三个组,分别到美、韩、法等国外去学习先进经验,最后从状态报告、经验反馈到运行维修管理等都进行了全面提升,逐步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核电管理体系,为我们取得今天优异的运行业绩奠定了基础。”

一颗螺丝钉,影响并改变了一群人!

一颗螺丝钉,影响并改变了一个企业!

一颗螺丝钉,影响并改变了一项事业!

本文选自报告文学《泰山里的中国》,有删节,《泰山里的中国》将于近期出版。